DOI:10.20270/j.cnki.1674-117X.2026.0005

传统节庆文化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机理、困境与路径

贺文峰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传统节庆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民族情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节庆文化正面临着文化实践场域逐步消解、价值认同偏移、文化本真性不断流失、传承机制失效等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应通过仪式化重塑强化在场体验，让文化认同“看得见”；借助跨媒介叙事，增强传播效果；利用价值理性引导，让文化认同“守得住”；嵌入教育体系，让传统节庆精神内核在代际传递中不断延续，从而提升传统节庆文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与形塑能力。

关键词：传统节庆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仪式化重塑；跨媒介叙事；价值理性引导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6)04-0060-09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并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核心主题。近年来，学界围绕如何有效铸牢这一意识展开了多维度探索：一是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2]；二是探讨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新质生产力等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机制[3]；三是通过边境旅游、隐性课程、研学旅行等教育与实践方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强化；四是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数字叙事等新兴技术为相关工作赋能。这些研究为深入理解并有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多元视角与重要参考。

传统节庆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民族历史记忆与集体情感，蕴含着团圆、团结、爱国等核心价值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内核高度契合，为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心理基础，是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然而，当前学界针对传统节庆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之间的系统性研究较为薄弱。现有研究多停留在表层关联阐释，缺乏对内在作用机理的深度解构，对现代化语境下节庆文化遭遇的困境剖析不够透彻，也尚未形成可落地、可推广的优化路径，难以对弘扬传统节庆凝心铸魂的文化价值提供切实的指导。为深化这一领域的探讨，本文拟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系统分析传统节庆文化在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内在机理、现

收稿日期：2026-01-3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互动仪式链视域下 Z 世代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研究”（XJK23CDY002）；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指导委员会课题“党的二十大精神系统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24JZW21）

作者简介：贺文峰，女，湖南茶陵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博士，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心湖南工业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

实困境及优化路径，以期为拓展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一、传统节庆文化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铸牢关键在于构建以共有精神家园为基础的文化认同，而维系这一认同的核心，在于共享的精神纽带[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5]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精神凝聚力，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内容。传统节庆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文化自觉、团圆团聚、家国情怀等价值理念。这些理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内核高度契合，为社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情感根基，成为维系社会发展的重要精神纽带[6]。

（一）通过情感联结，构建文化认同心理机制

传统节庆文化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具有相互渗透、双向塑造的紧密联系。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节庆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与传播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载体和情感认同基础。杨显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滋养和强大的精神支撑。”传统节庆的仪式活动及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正是增强文化认同、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资源。

“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一古语，生动揭示了节日期间个人与家庭之间复杂而深厚的情感联结。当亲人因故无法团聚时，家人对游子的牵挂与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交织成一曲浓郁的情感双重变奏。这种思念之情如同水向东流，势不可挡，构成了节日中最自然也最必然的心绪。相较于佳节之“思”，生离死别则是另一种无人能免的生命常态。清明“上坟扫墓”的仪式正是为了直面这一永恒命题，其静默地承载着生者对逝者绵长不绝的怀念。

“每逢佳节倍思亲”不仅将个人情感升华为对“家”的集体想象，更通过“祭祀先祖”“遥寄思念”等仪式行为，借助情感符号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结。这一点在春节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俗语，折射出春节在中国家庭中作为“年度盛典”的特殊地位，团聚始终是其核心内涵。从传统的“祭祀”“守岁”“燃放爆竹”到现代的“央视春晚”“网络拜年”，春节仪式虽形式不断创新、载体不断拓展，但其情感内核始终如一。

无论身处祖国大江南北，还是远居海外异乡，华人都以丰富的形式共庆春节，而“返乡团聚”始终是这一节日的灵魂所在。这种跨越千山万水的归家行为，体现了中华民族强烈的文化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感。其如同一根无形的文化纽带，将散布世界各地的个体紧密相连，构建起一个超越地理边界的想象共同体，使每一位成员都感受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与凝聚力。

全球华人对“春节团聚”的集体实践，已超越个体行为层面，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隐喻。通过共享“团圆”的情感体验，人们对家族的依恋逐渐扩展为对整个民族的情感认同，从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这一共同心理认知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作为象征符号，激活共同体意识集体记忆机制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为我们准确把握节庆文化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联系、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指引。心理学研究表明，集体记忆是一种基于社会互动与文化建构而形成的“共享记忆”。德国学者阿斯曼（Assmann）强调，仪式在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递中具有关键作用，其有效运行通常依赖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参与，二是对历史或文化意义进行周期性的重复实践[7]。作为典型的仪式性活动，传统节庆是集体记忆得以激活和传承的重要载体。

节庆日期作为节庆文化中最直观的符号之一，具有高度的识别性与象征性。许多传统节日采用“月日同数”的形式，如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这种数字的重复不仅便于记忆，也体现出人们对对称、和谐等审美价值的认同。传统节庆对家庭团圆的强调尤为突出，团圆主题贯穿于节日的饮食、习俗与仪式之中。例如，元宵、月饼等节令食品以其圆形形制，象征团圆与和睦；多个节日定于农历十五月圆之时，借助自然意象寄托人间圆满的理想，形成“形—意”对应的文化象征体系。

在行为层面，节庆活动通过一系列具象化的符号实践不断强化共同体意识。春节挂红灯笼、贴春联与“福”字，将吉祥如意的文化意涵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传统节庆通过符号系统的周期展演与重复实践，逐渐内化为群体成员的共同认知。当个体在特定时空中接触这些文化符号时，便会自然唤起对民族历史、文化价值与集体身份的认同，进而在心理层面构建起“文化共同体”意识。正如毛泽东在《采桑子·重阳》中所写“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词中所抒发的不仅是个人情感，更是文化传统对集体记忆的深刻唤醒与情感强化。

（三）凝聚道德价值，强化民族认同的深层共识

中华传统节庆文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践行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引领与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人能不能把握自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道德价值。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8] 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道德价值对于维护民族精神独立性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意义。

作为中华优秀道德价值的重要载体，传统节庆文化不仅承载着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更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发挥着价值凝聚与认同强化的深层功能。通过仪式化的集体实践，节庆文化将抽象的道德理念转化为可感可触的情感体验和行为规范，从而实现价值的内化与主体化。例如，缅怀先烈的仪式性行为，既在追溯历史中唤起对英雄精神的集体敬仰，也在对个体与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反思中，深化对“奉献”“牺牲”“家国一体”等价值理念的认同，进而推动道德意识向伦理实践的转化。中秋节则借助团圆与思念的情感主题，将血缘伦理中的亲情联结，升华为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与归属，清晰展现了“由家及国”的价值扩展路径。而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习俗，通过世代传颂其爱国精神与高尚人格，持续强化“忠诚”“正义”等核心价值观念在民族心理中的深层积淀。

当节庆活动成为民族成员广泛参与、深度共享的文化实践时，其背后所承载的“团圆”“和谐”“忠诚”等价值理念，便逐渐凝聚为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共识，推动文化认同向民族认同的深层升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价值基础。

（四）凭借时空整合机制，确保共同体意识延续

传统节庆文化通过“时间－空间”双重维度的整合机制，为民族文化传承与共同体意识的延续提供了稳定框架。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空间既生产社会关系，也被社会关系所生产[9]。传统节庆正是借助这种时空互动机制，实现文化认同的再生产与代际延续。

在时间维度上，节庆活动以年度周期循环展开，使“团圆”“祈福”等核心文化意象在代际传递中被不断重申与强化，构建起“传统－现代”之间的连续性认知结构。例如，在春节、中秋等重要节日，无论人们身处何地，大多会在特定时间节点参与共享团圆饭、赏月、吃月饼等仪式性活动。这些实践既是对祖先文化智慧的继承，也是对家庭关系与社会纽带的周期性确认，从而保障文化记忆在历史进程中得以延续与更新。

从空间维度看，传统节庆的结构呈现出“同心圆”式的扩展结构，从家庭内部的仪式实践逐步延伸至社区、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文化互动。以春节为例，庆祝活动往往从家庭年夜饭开始，扩展至邻里拜年、社区舞龙舞狮、城市庙会与灯会，最终形成全球华人共同参与的盛典。这种由近而远、层层推进的传播模式，不仅强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增强了社区凝聚力，更使全球华人在文化层面形成“同根同源”

的认同感。

这种时空整合机制在保持民族文化核心稳定性的同时，也赋予其适应现代社会的弹性。仍以春节为例，无论技术如何更迭，“团圆”这一核心象征始终未变；而“如何团圆”的方式却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从电视春晚到网络直播，全球华人得以在同一时刻共享仪式。这一“传统延续—现代重构”的动态过程，既拓展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边界，也使民族认同在多元语境中得以持续建构与再生产。

二、传统节庆文化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现代社会持续推进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节庆文化面临多重挑战：原有文化实践场域逐渐消解，多元文化冲击导致价值认同出现偏移，商业逻辑过度介入造成文化本真性流失，以及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机制日渐失效。这些因素严重削弱了传统节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本应发挥的作用。

（一）城市化进程下，文化实践场域消解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深刻改变了传统节庆的生存土壤。从物理空间来看，城市居住形态日趋集约化，高层住宅与封闭式社区逐渐成为主流。这种现代居住模式使得庙会、社火等传统节庆活动难以找到适宜的展演场所。以春节庙会为例，其在农村地区本是集祭祀、商贸、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社区凝聚力。然而，在城市中，受限于空间管制与公共场地不足，原本规模宏大、气氛热烈的庙会往往被压缩为商业综合体里的小型节庆市集，其原有的仪式感与集体参与性大为减弱。

在社会关系层面，城市化也催生了人际关系的“原子化”倾向。人们在享受城市便利的同时，也面临邻里疏离、亲情淡薄等现实问题。传统节庆活动多依托家族与社区网络得以传承，如中秋赏月不仅是赏景，更强调家人团聚的情感交流；端午包粽子也依赖亲友协作完成，体现集体参与的传统。然而，随着人口流动加剧，“空巢家庭”增多，邻里交往频率下降，许多传统习俗逐渐从集体仪式演变为个体行为。人们难以再通过集体活动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节庆参与更多转为个人化的浅层体验。

概言之，物理空间的压缩与社会关系的疏离，共同削弱了传统节庆作为情感纽带与文化载体的功能，使其原本具有的凝聚社区、强化文化认同的作用面临消解的风险。

（二）多元文化冲击下，价值认同出现偏移

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多元文化碰撞，使得传统节庆文化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西方节日借助符号化传播手段与消费主义的推动，构建出时尚化、浪漫化的文化叙事，不断挤压传统节庆的生存空间。圣诞树璀璨的灯光、情人节的浪漫玫瑰、万圣节的奇幻南瓜灯等鲜明符号，经由商业资本包装推广，迅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潮流标志。与之相伴的派对狂欢、礼物交换、角色扮演等庆祝方式，因其契合现代社交与娱乐需求，成为年轻群体表达个性、维系圈层的重要载体。相比之下，传统节庆如春节的年俗准备、清明节的祭祖仪式等，往往强调文化的庄重感和仪式感，在快节奏现代生活中显得参与“门槛”较高，需要更多时间投入与文化理解。这种差异导致部分年轻人对传统节庆的关注度和参与意愿有所下降，传统节庆的社会影响力因此面临被稀释的危机。

另一方面，西方个体主义价值观与传统节庆所依托的家国同构、集体主义理念之间形成冲突，进一步加剧价值认同的偏移。在全球化背景下，强调个人自由、独立与即时满足的观念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的生活态度与行为选择。他们更倾向于关注个体感受与个性表达，对具有集体约束性的传统仪式容易产生疏离。例如，在聚族而居已成为过去式的背景下，部分年轻人对小家庭之外的亲戚感情较淡，春节祭祖的肃穆礼仪、清明扫墓的家族集体行动等，在他们眼中逐渐失去吸引力，甚至被视作对个人空间的限制。传统节庆所承载的“阖家团圆”的家族责任、“慎终追远”的代际联结，与一些人日益追求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明显观念碰撞，导致部分民众对传统节庆文化日益陌生，认同心理日益弱化。

（三）商业逻辑主导下，文化本真性流失

在市场机制广泛渗透的背景下，经济利益日益成为传统节庆运作的核心逻辑，其原有的符号体系与文化内涵被大规模重构甚至简化。商家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将原本承载历史记忆与情感密码的节庆元素，压缩为单一的消费符号，使得丰富的文化表达逐渐沦为商业交易的工具。这一过程导致传统节庆的文化本真性不断流失。

以中秋节为例，月饼作为象征团圆的文化载体，原本寄托着“千里共婵娟”的情感，却在商业包装中逐渐异化为奢靡的礼品符号。镀金礼盒、镶嵌饰物的包装远超月饼本身价值，商家借助“高端定制”“限量发售”等营销策略，将其塑造为身份与阶层的象征。在此过程中，月饼所承载的团圆寓意被价格标签所遮蔽，节日的情感价值让位于商业噱头。

春节庙会同样面临文化厚度被冲淡的困境。庙会原为集祈福、游艺与民俗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空间，但在不少地方已沦为小吃摊与廉价商品的聚集地。舞龙、舞狮等传统表演被压缩为吸引人流的“快闪秀”，其背后的仪式意义与文化记忆在商业浮躁中逐渐被边缘化。

此类“去仪式化”与“去意义化”的改造，不仅削弱了传统节庆的外在形式，更置换甚至抽空了其核心文化内涵。例如，端午节的“挂艾草、佩香囊”的传统习俗被简化为“粽子促销”；重阳节“登高敬老”的伦理精神异化为“保健品打折”；腊八节“煮粥祈福”的民俗记忆沦为“满减消费”的营销节点。当“促销季”“打卡地”“流量密码”成为节庆的关键词，传统节庆便逐渐从文化认同的载体滑向商业营销的工具。其间所蕴含的民族智慧与价值理念（如对自然的敬畏、对祖先的追思、对亲情的珍视等）在消费主义的冲刷下不断流失其本真性，面临意义空洞化的危机。

（四）代际文化断层下，传承机制失效

在现代教育体系持续优化与生活方式日趋多元的背景下，传统节庆的代际传承面临结构性挑战。从知识传递层面看，当前教育对传统节庆的阐释仍多停留于表层。中小学教材往往将节庆内容简化为常识性知识点：端午节等同于“吃粽子、纪念屈原”，中秋节被概括为“赏月、吃月饼”，春节则局限于“贴春联、年夜饭”等符号化描述。此类教学方式既缺乏对节庆历史源流与演变脉络的系统梳理，也未能充分阐述其背后的哲学内涵与文化逻辑，如春节“辞旧迎新”所蕴含的时空转换观念、清明“祭扫”所承载的慎终追远伦理意涵、冬至“数九”所体现的天人和谐智慧等。当节庆教育沦为“吃什么、做什么”的表层知识灌输时，青少年容易将传统节日等同于假日安排与饮食习俗，难以体认其中蕴含的民族精神与文化深意，更无法形成真正的文化认同。

在实践层面，“90 后”“00 后”一代成长于城市化与数字化的双重语境中，其生活经验与根植于农耕文明的节庆习俗之间存在显著断层。传统习俗，如冬至祭天祈年、腊八赠粥睦邻、端午采药避瘟等，均深深植根于农耕社会的生产节奏与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之中。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被网课、电子游戏与都市社交填充，对节气与农事的关联、祠堂的仪式功能、邻里的互助逻辑缺乏切身感受，难以形成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与此同时，随着熟悉传统仪轨的老一辈逐渐老去，许多节庆技艺也面临失传危机，如端午草药辨识、中秋手工制饼、春节扎制彩灯等技艺，因缺乏系统传承与年轻接续者，正悄然退出当代生活场域。

知识传递的碎片化、实践体验的空白化与技艺传承的断代化，共同形成连锁反应导致传统节庆的传承机制逐步失效。节庆本应是联结祖孙数代的情感纽带与文化通道，祖辈口传身教历史记忆，父辈示范礼仪规范，晚辈在参与中习得文化密码。然而，当这一代际链条出现断裂，传统节庆便难以实现从“认知”到“认同”再到“践行”的转化，其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功能也随之趋于瓦解。

三、传统节庆文化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化路径

尽管面临现代社会多方面的挑战，传统节庆作为嵌入日常生活的文化基因，仍在社会文化发展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与法律保障已为传统节庆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制度基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其传播创新提供了新的可能。各族群众日常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密切，更亟需依托节庆文化凝聚共同文化情感、夯实共有精神家园根基，拉近各民族心理距离，凝聚全民文化向心力，厚植家国一体情怀。当前，政策、科技与教育共同搭建起传承的“舞台”，关键在于将这一“舞台”转化为“课堂”，使抽象的民族认同转化为每个人可感知、可参与的具身体验。基于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优化路径，以增强传统节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

（一）通过仪式化重塑，强化文化认同在场体验

仪式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依赖于特定场域的空间布局与氛围营造，使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实现意义共享与情感共鸣。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指出，仪式性传播的核心并非信息的空间扩散，而是通过共同参与在时间维度上维系和强化社会联结，具有天然的时空交织属性[10]。湖南乾州春节的实践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大年初一，民众汇聚古城门前参加庄严的升旗仪式。正月初三的“乾州春会”则将节庆氛围推向高潮，身着苗族传统服饰的女子以婉转歌声为盛会启幕，游客可与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一同“游春”“闹春”，融入节庆活动。古城门、青石板路、百年街巷等作为仪式展演的天然舞台，与升旗的庄重、游行的欢腾及非遗技艺的鲜活共同构成象征仪式链，使参与者在连贯互动中自然形成对地方文化及民族身份的认同。

然而，当前许多地区的节庆仪式流程依赖“约定俗成”，缺乏标准化建构，导致展演质量参差不齐，难以形成稳定的文化符号；互动体验多停留在“拍照打卡”层面，对节庆背后的历史与精神内涵挖掘不足，难以引发深度共鸣；代际传承机制薄弱，年轻一代对传统仪轨知识的掌握有限，非遗技艺面临“人走技失”的断层风险。

为应对这些挑战，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系统构建仪式化传播体系，围绕“传播主体、内容、空间、语言”四个维度，着力解决“谁来传、传什么、在哪传、如何传”的问题。在传播主体方面，应突出“乡土身份”，无论是本地民间艺人还是返乡青年，其在地情感与记忆更易唤起乡土认同，促进文化人才回流，为仪式注入原生动力。在内容建设上，需双管齐下：一方面规范核心仪式流程，保留关键传统仪轨以守护文化根脉；另一方面丰富呈现形式，通过故事化讲解与情景化演绎，阐释“端午挂艾草”“中秋寄相思”等习俗的文化内涵，使仪式从“习俗展演”升华为“价值共鸣”。在空间利用方面，应激活祠堂、古街、老茶馆等集体记忆场所，通过场景复原与文物陈列强化文化记忆锚点，使每一处空间均成为述说历史的“活态载体”。在语言策略上，需兼顾传统与现代，既保留方言、古语等特色语言形式以体现文化厚度，也应借助通俗讲解与视觉化手段提升跨代际、跨群体的传播效果。

此外，构建“参与式仪式”是增强文化体验深度的关键举措。可借鉴乾州春会中游客与传承人共同“游春”的互动模式，拓展为“学做灯笼”“学包粽子”“学唱民谣”等实践环节，引导参与者通过亲身操作，将外在的仪式流程内化为个人的情感记忆。这种“身体在场”的深度参与，能够有效消解个体与传统之间的疏离感，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实现情感认同与价值传递。

（二）借助跨媒介叙事，增强节庆文化传播效果

构建线上与线下深度融合的传播矩阵，传统节庆文化可以突破时空限制，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传播。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认知习惯与媒介偏好进行差异化传播，有助于提升文化传播的精准度和有效性。

针对以“00后”为代表的年轻群体，可依托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等技术，结合其数字娱乐偏好，打造沉浸式节庆体验[11]。以湖南乾州春节文化为例，可通过三维建模与VR技术复原古城风貌，精细呈现苗族银饰锻造、花灯制作等非遗工艺的细节流程。在内容设计上，可借鉴《黑神话：悟空》对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开发以“寻找年兽”为主线的主题游戏，融入苗歌对唱、舞狮挑战等互动环节。参与者通过AR扫描实景即可触发春节民俗剧情，实现虚拟与现实多维联动。在完成春联书写、虚拟烟花

等支线任务后，还可解锁包含节庆知识的电子图鉴，使文化认知自然融入娱乐过程。此类数字传播方式不仅为传统节庆注入时代活力，推动其从“活态传承”向“数字存续”演进，更有助于超越地域限制，打通各民族青年文化交流渠道，凝聚年轻群体共同民族文化情怀，在虚拟社群中拓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范围。

针对中青年群体，应注重传统元素与现代生活方式的有机融合，通过创意活动增强节庆的当代吸引力。如举办节日主题时尚秀，将盘扣、艾草纹样、玉兔图腾等传统符号融入现代服饰设计；或结合当下流行的户外露营潮流，推出“露营 + 龙舟体验”等新型端午活动，使参与者在竞技协作与自然互动中理解“同舟共济”的文化内涵。这类“传统基因 + 现代载体”的创新实践，能够在中青年群体熟悉的生活场景中有效激活节庆文化的感染力。

对于中老年群体，则可依托微信、抖音、B 站等常用平台，提供易于触达的文化内容。通过公众号推送《清明祭祖的伦理智慧》等深度文章，制作“奶奶教包粽子”等生活化短视频，以真实场景引发共鸣；同时开展“我家的节日故事”等线上征集活动，鼓励其从文化接受者转变为文化主动传播者。此类方式能显著扩大节庆文化的传播半径，增强中老年群体的归属感和传播意愿。B 站节目《唐宫夜宴》的成功印证了跨媒介叙事的价值。该节目通过服饰、舞蹈、场景的多模态融合，以生动叙事再现唐代宫廷文化，获得近千万播放量，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破圈”传播。这为传统节庆的当代转化与传播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范本。

通过实施分众化、多媒介的叙事策略，传统节庆文化得以跨越代际与认知差异，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形成文化共鸣，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注入持续而深厚的动力。

（三）以价值理性为导向，构建商业化与本真性平衡机制

推动传统节庆文化与现代产业深度融合，应坚持“文化价值优先”原则，既要通过市场机制激活传统节庆文化的生命力，又要守护其精神内核不被商业逻辑侵蚀。当前，传统节庆已展现出与影视、旅游、文创等产业结合的广阔空间，关键在于以价值理性为导向，在商业化过程中始终保持文化本真性的锚定。

在影视创作领域，可通过精品内容生动传递节庆的文化内涵。借助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形式，将节庆的历史渊源、民俗传统与精神价值转化为具象化的视听叙事。例如，围绕“二十四节气”制作系列动画电影，以故事化方式展现节气与农耕文明、日常生活的关联，使“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变得可感可知；拍摄《中国年俗》纪录片，记录不同地区家庭的春节准备过程，从扫尘祭祖到守岁团圆，以真实影像传递“辞旧迎新”的情感内核，引导观众从认知走向认同。

旅游开发应超越浅层观光，设计具有文化深度的“节庆主题研学路线”，将体验与认知有机结合。例如，在清明踏青活动中融入中医文化，设置草药辨识、香囊制作等环节，讲解“清明祛瘟”的传统智慧；将重阳登高与孝道文化结合，在登山路径中安排敬老故事分享、为长辈祈福等互动，使“尊老孝亲”的伦理自然融入实践。此类研学旅行的核心，是让参与者在亲身体验中理解习俗背后的文化逻辑，实现“行走中学习，体验中感悟”，既延续传统游学精神，也强化参与者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

文创产品设计应避免简单的符号堆砌，注重“形神兼备”，实现文化内涵的当代转译。如故宫博物院推出的“中秋月光宝盒”，以玉兔传说为灵感，运用光影技术呈现月相变化，配以古典乐曲改编的《月光曲》，既保留中秋“天涯共此时”的意境，又契合现代审美需求。

发挥此类产品的“文化解码器”功能，使消费者在使用中感知节庆精神。端午文创可围绕“祛病安康”主题设计草药香囊套装，春节文创则可开发可供手写祝福的定制春联，突出“团圆和睦”的文化内涵。通过“价值引领—产业融合—机制约束”的协同路径，传统节庆文化既能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焕发活力，又能有效防止精神内涵被商业稀释，最终实现文化传承与市场发展的良性平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提供可持续载体。

（四）将节庆文化嵌入教育体系，构建代际传承立体网络

习近平总书记于 2025 年强调，要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引导

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在此精神指引下，将传统节庆文化嵌入教育体系，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网络，成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

学校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主阵地，应突破“符号化认知”的局限，将节庆文化深度融入教学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可开发系统化的节庆校本课程，将“实践体验”与“内涵解读”相结合：在清明节组织“诗会＋祭扫”等相关活动，学生在诵读《寒食》《清明》等古诗的同时，通过讲述家族先辈故事，理解“慎终追远”蕴含的孝道伦理与生命关怀；端午节开设“香囊制作＋民俗讲堂”，在学习艾草、雄黄等草药知识的过程中，阐释“祛病禳灾”所蕴含的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智慧；中秋举办“赏月联诗会”，从“但愿人长久”的诗词延伸到“家国团圆”的民族情怀。这类课程超越简单的“手工课”或“活动课”范畴，以节庆为载体，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感知文化肌理，在知识浸润中领会精神内涵。高等教育阶段则应发挥学术研究优势，设立“节庆文化与民族认同”相关研究方向，通过系统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梳理，深化对节庆起源、演变及文化价值的理论认知，同时培养既懂传统又通现代的专业人才，为节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智力支持。

家庭是节庆文化传承的根基，是文化习得的活态土壤，其要义在于将节庆文化融入生活细节。通过“节庆家庭日”等活动，使传统习俗回归家庭场域。冬至时节全家共同制作汤圆，长辈讲解“冬至大如年”的节气智慧；除夕准备年夜饭时，父母可借助菜品寓意（如鱼象征“年年有余”）传递美好愿景；春节写春联，让孩子在运笔间感受汉字的文化密码。这种以身体参与和情感纽带为依托的方式，远胜于刻板说教，能在潜移默化中培植孩子对文化的深厚认同。

社会教育需构建开放式传承平台，弥补学校与家庭教育的不足，特别要发挥“代际反哺”的积极作用。社区可定期举办“节庆技艺工作坊”，邀请非遗传承人教授剪纸、皮影、糖画等传统手艺，让青少年在学艺过程中聆听背后的节庆故事；老年大学开设“节庆民俗讲堂”，鼓励退休老人分享不同年代的过节经历，帮助年轻人理解文化传承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价值。此外，博物馆、文化馆可推出“节庆主题展览”，通过文物陈列、场景复原与互动体验，打造沉浸式教育空间，增强全社会对节庆文化的感性认知[12]。

通过“学校引领认知、家庭培育情感、社会提供实践”的三维协同，既能解决传统节庆“教什么”与“怎么教”的问题，也能实现从知识传递、情感认同到行为践行的有效转化，使年轻一代在深度参与中理解节庆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总之，应高度重视传统节庆文化在形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独特作用，积极应对其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类现实挑战，统筹多方力量协同发力，通过仪式重塑、跨媒介叙事、价值引导与教育嵌入等多路径创新，推动传统节庆从“历史文化遗产”转化为“现代认同资源”，在守正创新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持续文化动能。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

[2] 李卫英，彭云青，李鹤松 .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J]. 民族教育研究，2023(5)：142.

[3] 郑恩，刘旭东 . 民俗文化赋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22-32.

[4] 萧放，叶玮琪 . 民俗生活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J]. 西北民族研究，2024，129(6)：6.

[5] 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 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2021-08-29(1).

[6] 张丽君，刘瑾 . 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作用机理与实践路径 [J]. 民族研究，2024(3)：53.

[7] Assmann A. Cultural memory[J].Social Trauma-An Interdisciplinary Textbook，2021：25−36.

[8] 向玉乔 . 中华民族的精神独立性与集体道德记忆 [N]. 光明日报，2025-09-15(15).
[9] 亨利・列斐伏尔 . 空间的生产 [M]. 刘怀玉，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64-65.
[10] 詹姆斯・W・凯瑞 . 作为文化的传播 [M]. 丁未，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86.
[11] 贺文峰 . 加快推进新时代思政课数字化转型 [N]. 湖南日报，2024-12-01(3).
[12] 崔舒怡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式生成的教育路径 [J]. 民族教育研究，2025(1)：26-27.

The Mechanism, Dilemmas and Paths of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in Shaping th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HE Wenfeng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embodies profound historical heritage and collective sentiments, serving as an indispensable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is facing a range of pressing challenges, including gradual dissolution of venues for cultural practice, deviation of value recognition, continuous loss of cultural authenticity, and failure of inheritance mechanisms. In response, it is essential to revitalize festival practices through ritualization and strengthen on-site experience, thereby making cultural identity "visible". It is equally important to enhance communication effects through cross-media narration and leverage value rationality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cultural identity. Festival culture can als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reby perpetuating its spiritual core across generations.

Keywords：traditional festival culture; sens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ritual revitalization; cross-media narration; value rationality guidance

责任编辑：陈璐